



大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三十七次全体会议

2000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四上午 10 时举行
纽约

主席： 霍尔克里先生 (芬兰)

上午 10 时开会

议程项目 122 (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A/55/345/Add. 9)

主席 (以英语发言)：秘书长在文件 A/55/345/Add. 9 所载的来信中通知我，自从他发出载于文件 A/55/345 和增编 1 至 8 的来文之后，海地已经交纳必要款项，把其拖欠会费减少到《宪章》第十九条规定的数额以下。

我是否能够认为大会适当注意到这一文件所载的信息？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 11 (续)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A/55/2)

达兰特小姐 (牙买加) (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对安全理事会主席、纳米比亚的马丁·安贾巴大使的赞赏，他简单明了地介绍了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年度报告。这场辩论不能被看成是例行公事，因为这为成员国提供了一次有益的机会，对安全理事会是否完成了《联合国宪章》为其规定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进行评估。

我们都同意，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性质在冷战结束之后并随着国内冲突的增加而有了急剧变化，给国际

和平与安全造成影响。这扩大了摆在安理会面前的问题的范围，并向安理会提出挑战，迫使它寻求更加积极地应付局面的方式。

去年，安理会设法更加照顾联合国更广大成员的要求。它集中关注非洲的冲突，目前正全力以赴进行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埃塞俄比亚同厄立特里亚的维持和平行动。今年早些时候，安理会同非洲大湖区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六国委员会的外交部长举行了会议。安理会也处理了以下各类问题：预防武装冲突；前战斗人员的复员、解除武装和重返社会；儿童与武装冲突；以及对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保护。所有这些问题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挑战。1999 年 11 月以及今年 7 月再次举行的有关预防冲突的辩论表明安理会决心按照秘书长的呼吁处理这一非常重要的问题，秘书长要求联合国在第二十一世纪里更加注重预防性的行动。因此，我国代表团期待着秘书长定于 2001 年 5 月提出的有关预防冲突的报告。我们相信，该报告将为安理会进行的行动提供一个基础。

安理会审议这些广泛领域中的问题是为了解决不属于特定维持和平特派团的授权范围以内的相关的交叉问题。与此同时，安理会派往东帝汶、科索沃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团以及最近完成的对西非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 (C-178)。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的访问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一次机会，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些复杂的任务，并及时对这些局势作出反应。

近年来，我们看到安理会努力对成员国的要求作出反应，提高它向大会提出的报告的水准，使其更加具有分析性和包含更多的信息。去年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看到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透明度有些改善。已经有意识作出努力，扩大成员国参加其讨论的程度。安理会以绝对更加有意义的方式同受影响的会员国进行联络，在报告所涉期间，已经制订出新的会议形式并利用以前使用较少的会议形式来同争端有关各方讨论敏感问题。

牙买加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安理会的工作应当尽可能公开进行。然而，采用非公开会议的形式使与会者得以坦率地交换意见。例如，在同前总统曼德拉和凯图米莱·马西雷爵士等协助者举行会议时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形式。我们认为，阿利亚模式会议也继续为安理会成员提供机会，同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的代表进行交往，这些代表经常深入从事安理会非常关心的问题。此外，前任主席对安理会工作进行每月评估合在一起对安理会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回顾。这并不是说我国代表团错误地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改革水平。仍有许多事要做。

牙买加目前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个当选成员，我们很荣幸以这一身份为国际社会服务。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暂时工作没有并实际上将不会使我们看不到对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和工作方式需要进行深刻的改变。实际上，帕特森总理在9月7日安全理事会首脑会议上指出，安理会的成员必须真正具有代表性；安理会不注意到过去半个世界里各国相对地位的变化以及联合国成员国增加，就会使其代表性遭到削弱，其民主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

制裁的使用是我国代表团继续关切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高兴，安全理事会已决定建立一个制裁问题工作组。我们期望能为精简制裁体制和规定实行与取消制裁指导方针提出切实的建议。我们要特别赞扬制裁委员会在安哥拉和塞拉利昂局势问题上所做的开

创性工作。这一工作进一步突出了武装冲突与非法开采自然资源，特别是钻石之间的联系。

近来几个星期，会员国一直在注意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大使领导的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小组的报告（A/55/305）。卜拉希米报告指出了联合国在和平行动领域履行其职责的方法中的严重弱点，并就预防冲突、维持和平行动和冲突后建设和平问题提出建议，供我们考虑。安全理事会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全面审查卜拉希米报告中与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建议。安理会成员已抱着谦虚的态度对待这项工作，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确承诺改善安全理事会履行其职责的工作。

工作组除其他事项外，已着手检查安理会的决策过程，同部队派遣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协作和有意义的协商的办法，确保维持和平行动符合国际人权体制的办法，如何建立清楚和明确的任务，反映出当地局势的需要和状况，以及安全理事会如何参与预防冲突，其中包括同其他的联合国机关和机构更加密切地合作。安全理事会已经要求该工作组尽快工作，清楚地表明安理会愿意改革维持和平行动。

我国代表团要强调，需要加强安全理事会，以有效地确保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将为此目标而努力。

最后，我国代表团由衷地祝贺新当选的理事国：哥伦比亚、爱尔兰、毛里求斯、挪威和新加坡。我们期望明年它们就任后，同它们在安理会中合作。

内贾德·侯赛尼安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请让我表示，我感谢纳米比亚常驻代表兼安全理事会主席安贾巴大使介绍安理会给大会的报告。我也要借此机会，祝贺新加坡、哥伦比亚、爱尔兰、挪威和毛里求斯当选安全理事会成员。我相信，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将在这一联合国主要机构现行结构所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帮助加强安理会的开放性、透明度和代表性。

《宪章》第 24 条赋予安全理事会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同时它还规定，安理会应将常年报告，并于必要时将特别报告，提送大会审议。换句话说，大会期望安理会就其工作向会员国负责，安理会的权利是会员国给的。安全理事会给大会的报告是在这两个联合国主要机构间建立负责制的法定联系。

因此，我们非常重视现在审议的议程项目。但是我们认为，该报告基本上仍然是一本文件汇编，罗列活动和重复与这些活动有关的事实。不幸的是，同以前给大会的报告一样，现在这份载于文件 A/55/2 中有 552 页、覆盖 1999 年 6 月 16 日至 2000 年 6 月 15 日的报告，仅描述安全理事会已经作了什么，但基本上不谈导致所通过决定的理由和情况。虽然，在报告所涉期间，广泛和经常的全体磋商仍然是安理会决策的主要支柱，但是报告中几乎没有关于这些磋商的材料。

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通过第 51/193 号决议，争取改革安全理事会的报告程序。该决议鼓励安理会实质性和分析性地介绍安理会的工作，并且特别包括有关安理会对其职权范围内问题采取行动前进行的全体磋商的情况。不幸的是，安理会仍然不能满足大会的愿望。

关于安理会的工作方式，我们欢迎和鼓励安理会在过去几年中采取的一些倡议，以其使安理会的工作方式更加透明和民主，使它的报告有分析、有内容。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过去七年中所作的协商工作已对安理会工作方式某些方面有了积极的影响，已在该领域取得了一些有限的进步，特别是在透明度和举行公开会议方面。

虽然我们认为应该把安理会的工作方式看作是一个总体的组成部分，但我们认为，这不应该妨碍安理会执行工作组中已经达成的临时协定，进而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式。因此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和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更多的交流，能带来安理会工作改革的更大进步。

无疑，塔吉克斯坦恢复和平与安宁和在这一国家完成和平进程及实现全国和解，导致联合国塔吉克斯坦观察团（联塔观察团）于 2000 年 5 月胜利结束，应该被列入安全理事会和整个联合国系统处理成功的问题之列。该国和平进程的积极结果可归功于包括联合国从该国敌对行动一开始就参与。联合国有力协助了谈判进程，这一谈判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安全理事会根据当事各方之间的《总协定》，给联塔观察团规定了一个明确的任务，并在必要时支持该观察团，积极响应它的需要。

在处理塔吉克内部冲突方面，联合国的参与和安全理事会持续的政治支持都极为有益。这一点在处理中东危机方面恰恰是一直缺乏的。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即使在面对以色列部队进行挑衅，对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平民过度使用武力，局势已明显危及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时候，还有人试图阻止安理会对此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尽管好几个区域集团提出了请求，但安理会用了很长时间才战胜反对意见举行了一次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公开会议。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非安理会成员参与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会议辩论的权利遭到了质疑和反对。我们感到很遗憾，在国际社会不能保护平民免受装备精良的占领军的残暴行为的时候，有些人拼命试图阻止联合国的广大会员国仅仅是表达其意见、期望、失望和甚至是愤怒。

尽管人们达成了普遍共识，即安理会目前的工作方法不适宜，在工作组内业已达成了一些重要的临时一致意见，以努力使安理会更具有透明度，更民主并使非安理会成员更容易参与，但看到有人极力试图进一步限制举行公开会议，阻止非安理会成员在安理会发表意见，这十分令人不安。

更广泛地来讲，过去几十年来安全理事会在处理中东局势上的做法，表现了其工作方法的不适宜和缺陷，特别是准许使用否决权的做法。过去，曾经多次呼吁过安全理事会承担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责任，结束以色列政权的野蛮的侵略行径。但令人

遗憾的是，行使或威胁行使否决权经常使安理会陷入瘫痪，使其不能在这种危急问题上履行其《宪章》规定的职责。

去年和今年，仅仅因为存在否决权就妨碍了安理会有效地处理科索沃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危机等其它问题。我国代表团关于否决权问题的立场，在不结盟运动的立场中已经明确说明，我们希望关于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的工作组将最终就限制否决权以便最后将其消除达成一致意见。

由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即备战和塔利班发动的定期攻势，严重的干旱持续快速蔓延以及塔利班在所控制地区施加的严厉限制和非人道待遇，致使阿富汗局势日趋恶化，这应继续得到安全理事会的密切关注。令人遗憾的是，塔利班继续拒绝在无数联合国决议中所反映的国际社会的再三要求，拒绝停止坚持以军事办法解决冲突，认真地参与旨在和平解决冲突的谈判。我们认为，安理会应继续向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并就业已作出的决定采取后续行动。安理会的持续政治参与，以及其决心实施关于阿富汗的各项决议，对于促使塔利班接受谈判解决办法是绝对必要的。

科尔比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有机会审议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的涉及 1999 年 6 月 16 日至 2000 年 6 月 15 日期间的报告。我们对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纳米比亚的马丁·安贾巴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出色地介绍了该报告。

该报告明确地显示了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活动的范围和程度。挪威欢迎国际社会日益求助于联合国来解决冲突，无论是在东南欧、西非或是东帝汶。国际集体安全依赖于各会员国致力于对多边合作。

挪威代表团感谢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对挪威的信任，选举其为下一个二年期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我们期待与安理会和大会其它成员一起合作，进一步加强安理会在处理世界和平事务中所发挥的首要作用。

大会享有合法权利充分了解安理会的各项活动。因此，挪威将努力工作使该报告载有更多的信息，对全体会员国更有助益。

尽管绝不能做任何事情减损安理会有效地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能力，但显而易见，和平与安全的问题与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其它发展机构负责的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挪威将努力加强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努力之间的相互联系。为了消除冲突的根本原因，安全理事会与负责诸如消除贫穷、发展援助、人权和环境等重要领域工作的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合作至关重要。

因此，挪威强调有必要制定一种解决冲突和建立和平的全面办法。这需要安全理事会、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其它有关的联合国机构之间进行密切合作。它还需要改进秘书处内部的协调工作。我们充分支持卜拉希米报告（A/55/305）在这方面所作的分析和提出的各项建议。

挪威代表团一贯强调提高安全理事会工作的透明度或公开性的重要性。我们也将安理会内部为此继续作出努力。近几年来，在这方面已确实取得了进展。我们欢迎已经确立并在继续改进定期非正式地与非成员分享信息的做法。

我们赞赏就安理会议程上的重要安全问题举行公开会议的做法。这些会议应确保联合国全体会员的意见在安理会的审议中得到考虑。

与此同时，公开会议应明确地侧重于相关的问题和有关的冲突，从而确保尽可能提高安全理事会解决冲突活动的效率。

我们欢迎安理会越来越多地以公开形式，而不是在全体磋商中举行诸如秘书处或特别代表介绍情况之类的会议。

挪威要强调充分利用为促进安理会成员与维持和平行动部队派遣国之间协商而建立的机制的重要性。所有部队派遣国，包括派文职人员参加多功能行动的部队派遣国，理所当然关心这些问题，因此在讨

论这些行动时，有必要与它们进行协商，从而使它们能够实际，而不是形式上地为安理会的决策过程作出贡献。

在最近几年里，区域和分区域组织已成为联合国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努力的日益重要工具。在非洲，情况尤其如此。挪威自豪地与这些组织以及非洲各国政府密切合作，以促进解决冲突、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合作。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安理会应充分致力于处理非洲面临的复杂挑战。

安全理事会仍然是国际社会寻求建立全球社会持久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中心。情况就应该如此。对联合国所有会员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二十一世纪里，安理会应保持强有力而毫不减弱的权威。联合国广大会员当然可以放心，挪威将充分开展努力并提供支持。

阿布勒盖特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表示赞赏纳米比亚常驻代表马丁·安贾巴大使向大会介绍了安全理事会的报告（A/55/2）。该报告是根据《宪章》第十五条和第二十四条提出的，它确认了我们所有人都坚持的有关安全理事会与大会之间关系的原则，这项原则使大会能够根据《宪章》履行其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固有责任。这使大会能够适当开展其有关工作，针对安理会的工作开展后续行动、讨论安理会的行动并就这些行动通过适当的建议。

我与先前的许多发言者一样，要特别提到安理会的工作和现有工作方法继续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首先，尽管安理会今年增加了公开会议的次数，但它在履行其任务时继续坚持采取不同的会议形式，对出席或参加这些会议设定了人为标准。这使安全理事会成为一个带有选择性的机构，其领导阶层只有数目有限的几个声音，它们力图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强加给其他方面，包括强加给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我们认为，根据《宪章》，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有权充分了解这个重要机构的工作情况。

第二，安理会继续采用一种封闭和不透明的办法来审议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任何一方单独的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一做法。然而，我们发现它花了数天时间讨论数个国家——不仅仅只是一个国家——提出的要求，即举行正式会议，以讨论全世界——也许不是安全理事会——确认直接影响国际安全的问题。我指的是巴勒斯坦领土的局势。安理会花了很多时间举行了多次会议，努力就涉及根据《宪章》保障所有会员国的权利的问题达成协议。安理会最后拿出了一项办法，但它却使它的一些成员能够以非常政治化的方式控制会议的最后形式。我们认为，根据所有会员国的章程——即《宪章》——所载明的规则和权利，这样做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第三、就一个相关问题而言，我们发现，安理会继续其孤立性倾向，坚持以排斥性方法制定维持和平行动的具体任务，而在制定这一任务时所依据的要么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信息，要么是片面或者也许不准确的建议，抑或是根据其成员间的讨论，但是那些拥有实际、技术和军事专门知识的国家却没有参加这些讨论。

因此，我们发现此种做法的结局是，安全理事会设定了一系列任务和行动，并认为，来自一些国家的部队——其中大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将会匆忙前去执行和开展这些任务和行动。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清楚体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维持和平行动中。埃及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熟虑后，决定不参加这一行动，尽管它曾多次致力实现非洲的和平。

假如我们要重申过去一年里安全理事会决议中具有积极意义而且令人鼓舞的两点，它们就是：对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实施制裁以及对禁止塞拉利昂钻石的非法买卖所设定的时间限制。这些当然是令人鼓舞的例子，并且充分证明埃及代表团和许多其他代表团以前所提出的要求，即：安理会需要停止实施没有时间限制而且影响深远的制裁。自 1990 年代初期以来，安理会已越来越多地诉诸此类制裁。

在这方面，我要提到埃及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安理会所实施的制裁绝不能给人民造成不良影响，此外，在考虑实施制裁之前，应考虑到人道主义方面，因为制裁会给各个社会的基础结构造成不良而且有时是破坏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大多数制裁都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

我还要重申不能让安理会成员，尤其是常任理事国的狭隘政治或本国国内考虑凌驾于安理会或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集体考虑之上，因为任何此类做法都会使安全理事会成为其成员推行本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工具，那样做从任何标准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改革安理会工作方法和提高其工作透明度的问题只是实现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工作和结构的重要方面之一。埃及代表团通过安全理事会改革和扩大问题不限名额工作组积极参与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期待它尽快恢复工作。

我们必须提到最后一点。它涉及安全理事会所面对的一个威胁国际或国内和平与安全问题。尽管存在这一威胁，安理会未能处理这一局面，它没有表达它的意见，也没有采取措施或行动。出现这种状况是由于它的一些常任理事国威胁要阻止或防止采取预期的行动或措施或表达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应该有政治和军事强国和联盟来解决或处理，而没有一个正当与合法的联合国框架。另一方面，我们都应该认识到，在这种安理会失职的情况下，大会仍然是本组织召集所有会员国的主要立法机构，它始终可以表达它的意见。

大会代表国际社会。任何时候，只要安理会不承担其责任，都能采用“联合一致共策和平”决议。这项决策过去已经不只一次地被采用。这样做就排除了允许干预行动和采取并非总是享有充分国际合法性的行动与措施的可能性。

阿巴斯女士（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们表示，我国代表团赞赏纳米比亚常驻代表兼安全理事会 10 月主席马丁·安贾巴大使有力地介绍涉

及 1999 年 6 月 16 日至 2000 年 6 月 15 日期间的安理会年度报告。

我们高兴地看到，大会今年对该报告的审议再次提供机会，根据《宪章》第 20 条第 3 段，在联合国这两个主要机构之间进行必要的交流和实质性对话。鉴于《千年首脑会议宣言》，在我们加强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中，完成这样一项根本任务已变得更加重要。

不用说，这种进程必然支持和加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履行各自职权的作用。我国代表团认为，更重要的是，每年这样做突出安理会对大会的负责，而且也有助于在安理会作用和联合国其他主要机构作用之间，实现更好的平衡。

我国代表团正是这样考虑现在摆在我们前面的今年的报告。我们乐意承认，对安理会提出的一些正当要求已经得到安理会成员的响应，并反映在安理会的这份报告中。最明显的包括增加公开会议，让非正成员广泛参加，对审议的问题提供他们的宝贵见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步骤，它将带来更加平衡和公正的决定，特别是当这些决定直接影响有关方面的时候，以及在这些决定的有效执行方面。

尽管有这些不断和积极的改进，但遗憾的是不能否认，报告基本上仍然是给安全理事会的文函和安理会通过的决定的堆积。因此，我国代表团再次要求，安理会的年度报告不应再仅仅描述人们已经知道的活动和复印人们已经知道的决议。相反，它应该包括对各种问题决定的评估，以满足更好地澄清和理解安理会采取这些决定的理由和动机的需要。

我们也看到，各制裁委员会的程序已经变得更加透明，非成员能看到更多的资料，特别是通过主席提供的通报。其中有的是实质性和详细的。

另一方面，虽然我们承认制裁作为《宪章》规定的一种强制手段的合法性，但是制裁应该有明确和具体的时间规定和适当的审查机制。最重要的是，一旦目标达到，就应该取消。否则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

样，制裁造成巨大的痛苦，不仅对被制裁国家，而且对邻国及其以外。

印度尼西亚也越来越不信任和怀疑制裁的理由和用处。我们还认识到，过去十年，安全理事会实行了 12 次制裁，但在这之前总共只有 2 次制裁。仅仅这一增加和它所带来的入道主义后果就需要对制裁进行痛苦的重新评价。我们认为，安理会目前正在进行这种评价。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也应该认真审查，以确定失败的原因，防止今后再遭这样的挫折。过去的经验都已带来非常有用的新认识，因为本组织今后将要处理同样的局势。面对战地不同寻常的迅速发展，维持和平行动已经变得极其复杂，增添了新型的任务。这些任务转过来又促使我们注意特别是维持法律和秩序、征聘专业人员、改进后勤工作、需要更好地训练和装备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部队和适当的安全理事会授权，以及有够用的资源。

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透明度，在安全理事会、秘书处和部队派遣国之间进行直接协商，已经成为惯例，特别是在需要长期延长时。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安理会工作走向更加透明的积极趋势，这是我国代表团充分支持的，是必须鼓励的。

作为一个部队派遣国，这些问题是印度尼西亚非常关心和关切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一时刻，当维持和平行动面临新的挑战 and 复杂性，当国际安全的性质与条件在发生根本变化时。联合国在新千年的信誉可能除其他外，取决于它有效地履行它维持和平的责任。鉴于这些原因，为了在今后作出我们的微薄贡献，我国政府最近已决定建立一个全国维持和平训练中心，以便利它继续积极参加这些行动。

安理会的责任将最终根据它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公平和公正决定的记录来判断。但是，最近实践往往表明有选择性和在处理同样局势时采用不同的尺度与标准，这回过来会影响安全理事会的信誉。

在一个充满紧张与冲突的世界中，安理会仍然是我们唯一的和平希望。这一点已反映在安理会的报告中。报告描述它如何不断努力采取适当行动，应付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采取不同措施，争取控制和解决冲突；以及组织对这些措施的区域和国际支持。

我们希望安理会将在其决策中考虑到广大会员国的观点，以便能够维持其道德权威。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还认为如果安理会更深刻地评估在目前辩论中所表示的观点以期采取可执行的后续措施，则这些观点会更有益于广大会员国。

最后，我要祝贺哥伦比亚、爱尔兰、毛里求斯、挪威和新加坡代表团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我们谨祝它们成功地履行其职责。我还要感谢离任的安理会成员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做的重要贡献。

贝林加·埃布图先生（喀麦隆）（以法语发言）：

我首先热烈祝贺安全理事会 10 月份主席、纳米比亚常驻代表马丁·安贾巴大使阁下。我们感谢他昨天在介绍安全理事会 1999 年 6 月 19 日至 2000 年 6 月 15 日期间情况的报告时所做的十分详实的发言。他的发言全面描绘了安理会的工作。统计数字是不言自明的。正如安理会主席所提到的那样，也正如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安理会举行了 144 次正式会议和 194 次全体磋商，审议了 85 份以上的秘书长的报告并收到了各国及区域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 1165 份其他文件和信函。安理会通过了 57 项决议草案并由其主席发布了 38 项声明。安全理事会通过派遣其特派团而在一些冲突地区确立起存在。正如主席告诉我们的那样，安理会的工作正在日益透明的气氛中展开。我们欢迎这一趋势并鼓励安理会加以继续。

我们还感谢一些安理会成员，它们在本次辩论中的发言使对一些人来说似乎相当枯燥或仅仅是只有事实资料的报告更加充实，从而丰富了我们安理会运作及它如何承担其维护和平的责任的理解。我尤其想到了法国常驻代表让·达维德·莱维特大使的发言。

我还最热烈地祝贺哥伦比亚、爱尔兰、毛里求斯、挪威和新加坡的常驻代表，他们的国家是我国的朋友，刚刚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

我今天发言的主题将是非洲和安全理事会。但我首先谨谈几点一般性看法，并就我们目前对秘书长报告的审议提出几个问题。我们还记得，该报告是根据《宪章》第 24 条第 3 段和第 15 条第 1 段提交大会的。第 15 条第 1 段写到：

“大会应收受并审查安全理事会所送之常年及特别报告；该项报告应载有安全理事会对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所以决定或实行之办法之陈述。”

所以，大会在事后审议安理会的活动。这种事后审议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大会是否有权指导安理会的审议，或仅仅有权收到情况？这些是那种我们应在某一点上辩论的问题。

第 24 条第 3 段指出下面

“安全理事会应将常任报告，并于必要时将特别报告，提送大会审查。”

安理会应把其报告提交大会“审查”的明确规定是否排除了大会批准或拒绝这种报告的权利？这是另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谈到报告的实际内容，是否应要求安理会说明提交报告内容的理由？如果我们把第 15 条第 1 段及其逻辑上的延伸即第 24 条第 3 段的规定合并在一起，就会发现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维护和平方面面临的重叠管辖权问题的核心。

我们应在某一阶段就这些问题进行辩论，以至少对我刚才提出的一些问题做出答复，并使我们对安全理事会报告的审议和辩论更加集中。但同时，对安全理事会活动的兴趣，使我想未来对安理会报告的讨论能否引起一场互动的对话。在实现这种互动的对话之前，安理会能否专门开一次会来分析报告有关的各种看法、批评和建议？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理会

主席邀请大会对报告进行深刻分析，并保证安理会委员会考虑我们的看法和意见。他的邀请和保证这样才会有意义。

这些看法和初步意见促使我回到发言的主题，涉及安全理事会中的非洲问题。

在所审议期间，非洲在安理会的议程上继续占有重要位置，安理会继续讨论非洲问题，有时是在最高层次上。举行这些讨论和会议的消息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极大希望，但据说，讨论和会议的结果又往往不能满足这些希望。

非洲也使安理会有机会深化其对和平的通盘考虑。例如，安理会曾举行关于艾滋病及其对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的会议。

但最重要的是，在今年一年里，安理会对其与非洲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例如，1999 年 12 月 15 日，安理会举行了一次公开会议，专门讨论联合国与非洲的伙伴关系。从非洲人的角度出发，摆在我们面前的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促使我回到这一基本的伙伴关系上。

虽然非洲是我们这个地球上饱受武装冲突蹂躏的地区，但它必须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因此，其与联合国乃至安全理事会的伙伴关系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一种必须。

非洲问题一向会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大陆的丰富资源吸引了许多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非洲确实都是很重要的。因此，我谈到的伙伴关系应是非洲在维和与安全领域中的头等大事。维和涉及特别通过部署维和行动和建立和平行动，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在这一领域中的行动，也即维和，按照《宪章》，是安全理事会的责任。但此类行动要想行之有效，必须纳入非洲，在征得其同意并获得其全力合作的情况下进行。

早些时候我说过，非洲拒绝宿命和屈从。实际上，我们大陆的每一个主要分地区都建立了预防、解决和管理冲突的特殊结构。在中部非洲，中部非洲国家经

济共同体在负责维和行动的中部非洲多国部队援助下，设立了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委员会。

在西非，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设立了一个调停与安全委员会和一个监测组（西非监测组）。在南部非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有一项负责和平与安全的特设安排，该安排根据具体情况，就分区域部队的部署作出具体决定。在东非，设立了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除了这些分区域机构，我们还有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专门机构，负责预防和解决冲突。

所有这些都表明，非洲拥有相关结构，安全理事会如果真正希望非洲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必须加强其能力。

我们的大陆是一个伙伴，从体制的意义上讲，它有能力满足《宪章》第八章第 52 和第 53 条的要求。需要的是在预防冲突、早期预警和维和领域改进和巩固区域措施。加强非洲的能力还应包括对和平协议给予财政支持。这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世界其他地区，伴随此类协议的签署，一向会有某种财政安排，特别用来处理因此引起的社会问题。没有此种财政安排的任何和平协议都包含了不安定的种子。一项和平协议，如果比例没有对前战斗人员重新融入社会作出规定，前景会是什么样的呢？和平协议中如果没有对儿童士兵作出规定，前景又会是什么样的呢？

最后，我希望请安全理事会考虑一下，是否能指定什么人作为非洲协调员，与秘书长一道开展工作。此人的任务是确保充分履行《联合国宪章》第 54 条的规定，因为该条要求为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起见，以区域办法或由区域机关所已采取或正在考虑之行动，不论何时应向安全理事会充分报告。此一协调员还应在秘书长和非洲领导人之间起到联络作用。最后，非洲协调员应负责协助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执行秘书长在其关于非洲的持久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条件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今天，我们收到了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安全理事会的报告。非洲是世界上在这些冲突中首当其冲的地区。正如我早先时候说过的，这一局势不是命中注定的。非洲拒绝宿命的观念。

请允许我回顾秘书长 1999 年 9 月 29 日在安全理事会中的发言：

“不管如何的不完善，非洲都存在许多重要迹象，显示了其对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渴望及其为之而奋斗的意愿。目前，只要认真选准对象，提供恰当的支持，就可以帮助非洲人渡过难关，迎接一个更光明的未来。让我们抓住这一时机。”

（S/PV.4049，第 5 页）

在大会将就安全理事会的报告采取行动之际，让我们采取行动确保安全理事会能够帮助非洲，使之成为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伙伴和安理会在这种努力中的一个伙伴。

拉坎尼劳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首先，菲律宾代表团感谢纳米比亚的马丁·安贾巴大使明晰地向大会本届会议介绍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菲律宾代表团还热烈祝贺哥伦比亚、爱尔兰、毛里求斯、挪威和新加坡的代表，祝贺他们最近当选接替于年底空缺的安理会 5 个非常任理事国。菲律宾代表团相信，这些新成员将对安理会今后的工作作出积极的贡献。

大会每年例会都审议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会员国每年一度地发言，提出看法，并大致上就安理会过去一年的工作表现提出精致的分析。

这种年复一年的做法有其作用和目的，那就是让非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家能够对安理会过去一年的工作表示看法。但报告也代表了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之间日益增长的裂痕。在这个讲坛上所作的发言里，明显存在着对安理会日常工作的不满，因为安理会几乎忘记了其它会员国的普遍的情感。

尽管大可对这种说法进行认真的辩论，事实却是，非安理会成员国就安理会的工作表达看法的唯一机会只有在大会例会中总共一、二天的会议时间。因

此，不难想象，大会和安全理事会这两个机构看来在重要的问题上不合拍。如果联合国真要更有成效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就必须添平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广大会员国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可以通过各种办法实现这一点。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之间应定期举行磋商，特别是就根据《宪章》第七章行使安理会特别的执行权力问题进行磋商。实行制裁和确定维持和平的任务规定，是重要的问题，就此进行磋商不但有益而且必要。经验表明，制裁对平民和第三国造成有害的影响。一些制裁办法已出台几年，但实现既定政治目标、即改变犯错误的政府和当局的行为方面建树却很少。同时，制裁对平民和第三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若要有有效和公正，实行制裁就必须得到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支持。尽管意见的一致并非现实的目标，但要确立制裁的办法，安全理事会还是应该得到相当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的支持。要维护制裁办法的公正，这就是一个实际的考虑。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主要职责。维持和平是联合国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持和平能够具体体现各国为了和平的事业建立的伙伴关系。近年来维持和平的人力资源严重短缺，小国派遣部队也成为必不可少。在过去几年里，从帝力到乔治敦，我们看到维持和平已经发生了永久的变化。维持和平的发展已经到了联合国广大会员国如不给予相当的支持就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有多么强大，都不能成为世界的警察。呜呼，只有通过所有人的真挚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全球的和平与稳定。

正是在这方面，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磋商在政治上具有意义。安理会更大的透明度能够增进会员国对安理会的信赖和信心，推动安理会从事的对国际社会有重要意义的事项。这种公开性将给安理会带来更多的政治支持，有利于实现全球和平。

菲律宾代表团赞赏安理会过去一年为使工作更透明和公开采取的主动行动。我们许多人有机会参加

了有关联合国许多重要议题的安理会公开会议和吹风会。安理会主席也就安理会非正式磋商的结果进行了定期吹风。安理会还多次同部队派遣国举行对话，大大有助于通报特派团地区的需要和解决它们的困难。这一做法是朝着使部署联合国和平特派团的进程成为完全的共同参与和协商性的进程方面迈出的正确一步。

尽管这一趋势令人鼓舞，实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间的全面伙伴关系的道路依然艰难曲折。

人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已成为把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排斥在外举行不公开会议的一个秘密俱乐部，要克服这种普遍的反感情绪还需进行许多工作。必须在安全理事会同大会之间建立一种真正的互动和协商机制。促进和平的工作不是一种一个机构必须竭力排斥所有其他机构的零和对策。如果联合国要实现人们所期望的人人享有和平与进步的目标，就必须使每一个人都能作出贡献。

虽然大会将在一个月后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但在大会对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进行审议时，安理会的改革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在现阶段，当联合国的会员有 189 个主权国家时，看来应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安全理事会目前的成员数目和结构是否仍然全面和公正地代表了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利益。其成员中只有五个国家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其他的 184 个会员国都必须等着轮到它们来填补任期两年的 10 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联合国继续是一个严重不均衡的组织。人们不仅要问，这种内部不均衡怎么能长期延续下去而不永久破坏联合国执行其任务的能力。

安全理事会目前的安排和构成是在 55 年前确定的，今天在这个大厅里就座的许多人那时还没有出生。更重要的是，那时候世界和联合国所有面临的挑战与现实与今天不同，现在是认真审查然后改变目前模式的时候了。

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讨论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问题已有七年之久。我们必须重新点燃熊熊大火，使工

作组走得更快一些。我们不能在等 55 年，等工作组对安全理事会的改革问题作出答复。世界事务没有耐心容忍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和无休无止地作姿态。

沙尔马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真诚地感谢纳米比亚常驻代表马丁·安贾巴大使清楚地介绍了安全理事会向大会提交的年度报告。这份很长的报告反映了在审查所涉期间安全理事会必须进行的工作的范围和复杂性。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尽了很大努力来编写这份报告，提交给广大会员国，我们应对此表示感谢。

在报告所涉期间发动的四次特派任务中有两次——在科索沃和东帝汶——涉及建立国家问题，这一事实证实联合国在维持和平方面面临多种多样的挑战。多年来，广大会员国一直要求使安全理事会的职能更加透明和更加民主，并使其结构更具有代表性。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们几乎还没有涉及其表皮，要实现这些根本性的目标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尼泊尔对安全理事会程序改革方面取得的一些进展表示赞赏。根据《宪章》，会员国责成安全理事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安全理事会代表广大会员国履行这一职责。因此，安理会有义务信任非安理会成员国，同它们进行磋商，并随时使它们了解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我们那些不需选举就能担任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大国朋友们事实上负有特别注意使这一进程更加民主的道义义务。

在这方面，向非安理会成员国举行公开情况介绍会以及同部队派遣国单独举行会议无疑是令人欢迎的事态发展，但这远远不够，因为它们没有使非安理会成员国有机会为使维持和平与缔造和平活动更有成效而提出他们的意见和观点。

另一方面，在实际情况中公开辩论很少对安理会的实际决定产生重要影响。无疑，作为一种百花齐放的学术活动它们很有意义。非安理会成员国要求的不是理论讨论，而是在一个与它们切身利益相关的进程

中交流观点，提供投入和提出建议。在紧急情况下也许不可能同非安理会成员国事先进行磋商，但在要求会员国派它们的人员参加有可能丧失生命的任务以及要求它们承付资金之前同它们进程磋商则完全是公平和合理的。归根结底，根据我们所有人都表示赞成的民主原则，在要求会员国承诺承担风险之前应听取它们意见和使它们了解情况。正式会议只是用来使在关起门来进行的非正式会议上达成的决定成为正式决定，它们仍然只是一种形式，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安理会在决定发动一项行动时必须采用客观的标准。然而，使人们感到忧虑的是，有大量的例子表明安全理事会并没有以公平的方法处理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往往某些成员的国家利益压倒了区域与全球和平的更大利益。这特别使小国感到痛苦，因为这些国家的安全主要有赖于安全理事会，国际知名人士小组关于卢旺达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深感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制裁问题。尽管它们是《宪章》规定的一种有用手段，但它们范围广泛的影响要求谨慎而有节制地予以运用。通常，制裁所伤害的是受制裁的国家的无辜人民，而不是它们打算影响的人。与此同时，制裁往往伤害第三国，使它们也成为无辜的受害者。如果一定要实行制裁，就应作出特别安排，使它们击中目标而不是击中目标的周围。此外，如果制裁伤害了无辜的第三国，就必须对它们造成的任何不应有的苦难和损失作出赔偿。

我们赞扬卜拉希米专门小组的胆识，因为这个专门小组大胆地指出了什么人该受到责备。它还指出了应对若干特派团的失败负责的模棱两可和不现实的任务规定。此外，该专门小组的报告（A/55/305）还提出了若干有益的建议，用以改进处理和平问题的方法，并将今后的失误降低到最低程度。

我们各国领导人在最近的历史性的千年首脑会议上重申必须更有效地维持和平与安全。他们决心进一步尊重国际事务中的法治，并使联合国得到它执行其任务所必须的资源和手段，使联合国更有效能。

如果我们要实现《千年宣言》的理想，我们就必须全面改革安全理事会。尼泊尔愿意考虑在可获得批准的协商一致意见的基础上扩大安全理事会。但我们认为，迫切需要广大的会员国感到深信的是，改革后的安理会将变得更为民主、更透明、更具代表性并更加负责。会员国必须在审议改革建议的同时，就能在安全理事会处理问题的办法和行动中看到这些特性。

人道主义干预已成为有争议的问题之一。我们以前已发言详尽地谈论了这一问题，我们现在依然坚持我们的立场。

现在是我们应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了：不有效地处理冲突根源的状况，我们能支撑多久？众所周知，大多数冲突的根源都在于贫穷和社会排斥。

在教育、保健和减缓贫穷方面的投资，可在促进持久和平方面产生引人注目的结果。安全理事会应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其他有关机关和机构通过伙伴关系共同努力，以有助于对付这些问题。它必须有所克制，抵挡住超越其任务范围的诱惑，因为这样做就会使它精疲力尽，降低它的效能，并损害其他主管机构。

必须极其谨慎地履行因广大会员国对安全理事会的信任而产生的义务，从而不致使大会受到冷落或靠边站。

在结束发言前，我衷心地祝贺哥伦比亚、爱尔兰、毛里求斯、挪威和新加坡最近受之无愧地当选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我深信，这些新的成员国将作出努力，使安理会能对会员国的期望作出更好地回应，因为作为由会员国选出的代表，这些新的成员国体现了它们的信任。

穆塔博巴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我十分感谢有机会参加这次关于安全理事会工作的辩论。

首先我要热烈祝贺安全理事会新当选的成员国：哥伦比亚、爱尔兰、毛里求斯、挪威和新加坡。我国代表团期望与它们合作，并在它们的任期内予以充分

合作。我们鼓励它们与它们在安理会所代表的国家共同工作，而不是象许多成员国在过去所做的那样，试图捍卫其本国的利益——那些成员国的作法是错是对，这是可以辩论，但我并不希望参加这种辩论。“透明度”和“客观性”是应该用于指导它们的两个词，而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它们在联合国进行的杰出工作，我们相信它们将会比它们的前任做得更好。

我还要借此机会，祝贺安理会的成员在各个冲突地区进行了实地视察。我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学到更多的东西，并明智地作出决定。

我国代表团认真地阅读了关于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报告，我们祝贺安理会主席代表安理会进行了良好的工作。但是，在安理会旨在不断改善其产出的努力方面，仍有很多工作尚待进行和改正。鉴于卢旺达的糟糕的经验，我国代表团建议，关于安全理事会工作的报告应包括6个重要事项：第一，在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内分配给安理会的任务；第二，可供履行安理会任务使用的手段；第三，定期评估在履行其任务方面完成的工作和遇到的困难；第四，在关于在何地如何和为什么等问题方面作出的决定和采取的行动；第五，从特定的特派团中学到的经验教训；第六，今后的行动计划。

这样就将提供一种大会会员国希望阅读到的客观和现实的报告概要，而不是提供一种就常规格式的报告，因为这种报告并不反映在行动实地或秘书处总部本身的现实。

安全理事会现在就应该进行改革，反映出大会会员国的观点，因为它应代表会员国进行工作，并向它们负责。现在安理会的成员国应进行反省，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做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是否是以最佳的客观的方式做了这些事？”而且还应提出更多的问题。

当我们记得，在卢旺达情况中，种族灭绝政府代表忙于向理事国提供有关实地局势的错误情报并误称人们始终听取他的意见时，这组问题对大家都是重

要的。今后，安理会在审议与一个安理会理事国有直接关系的事项时，应坦率一致地暂停该理事国出席。另一方面，应记住安全理事会动一动笔本来可以拯救卢旺达人生命，只需改变联合国卢旺达特派团的任务和/或用在基加利着陆撤退本应拯救生命的人的那些大型飞机来增援部队或武装部队。

卡尔松报告和非洲统一组织发表的国际知名人士小组的报告详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应执行的建议。

现在是时候了，安全理事会应饶过其意见仍有人听的一些成员的个别利益，听者可能担心破坏旧的联盟，并破坏派某些人去这个或那个地方和允许其他人在别处行动的君子协定。这种出于个人好处或所谓国家利益的肮脏安排和交易的直接受害者有许多话要说。然而，不必述说或听取这种悲惨而本来可以避免的故事，将是安理会的成功。安理会现在可以纠正这种趋势，因为卜拉希米报告说得恰到好处。

我国代表团从不相信，军队或安全理事会在任何需要的地方设立维持和平行动时不可能软着陆。现在是时候了，安理会应报告其在各种情况下作出的选择——特别是在卢旺达的情况，在诸如对仍得到跨边界支持的灭绝种族者、联攻派和前卢旺达武装部队成员实行的制裁和武器禁运方面——并保证其整个工作和各项决定的客观性和透明度。这将团结我们，作为同一家庭的互相信任的成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关于本项目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注意到载于文件 A/55/2 的安全理事会报告？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就此结束本阶段对议程项目 11 的审议。

议程项目 8（续）

通过议程和工作安排：荷兰关于议程项目 181 信（A/55/495）

主席（以英语发言）：文件 A/55/495 载有 2000 年 10 月 18 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就题为“联合国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合作”的议程项目 181 给大会主席的信。

成员们将忆及，大会在其 2000 年 10 月 17 日第 35 次全体会议上，决定将这一项目列入其议程，并在大会全体会议上直接审议。在这方面，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其信中请求在 200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审议该项目。正如载于文件 A/55/234 他关于该事项的前一封信和解释性备忘录所指出的，他进一步说，这个议程项目非常紧迫，因为《联合国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关系协定》于 2000 年 10 月 17 日签署。大会尽快对此《协定》的签署这一重大事件作出反应是适当的。因此，他请求不要执行大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关于任何增列项目必须在其列入议程已满七天才可予以审议的规定。

我想现在与各代表团协商于明天，200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审议议程项目 181 的安排。

我谨请成员们注意大会议事规则第 15 条有关规定，其内容如下：

“任何增列项目必须在其列入议程已满七天，并有一个委员会就有关问题提出报告后，才可予以审议，除非大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其他决定。”

没有人反对，我将认为大会同意安排于明天，200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审议议程项目 181。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其信中进一步说，签署此《协定》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出席这场辩论是适当的。因此，他请求让总干事有机会向大会发言。

没有人反对，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听取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于 200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在议程项目 181 下的发言？

就这样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议程项目 181 将于 2000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审议，作为第二个项目。议程项目 181 的发言报名现在开始。

议程项目 31

消除以强制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

(a) 秘书长的报告 (A/55/300 和 Add. 1 及 Add. 2)

(b) 决议草案 (A/55/L. 9)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要通知成员们，瑞典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其 2000 年 9 月 21 日以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 9 月份主席身份给秘书长的信中，请求大会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教廷观察员关于议程项目 31 的发言。

考虑到对讨论中事项的重视，提议大会就此请求作出决定。

我是否可以认为没有人反对听取教廷观察员在关于议程项目 31 的辩论中发言的建议？

就这样决定。

杜尔达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提出的摆在大会面前的项目不只同利比亚有关，而且同整个国际社会有关，即同联合国全体会员国有关。这一项目本质上涉及违反或根本违反国际法准则、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一个国家通过其立法权力决定制订一项法律并着手在其领土管辖区之外实施这项法律。它把一项只为其私利服务的法律强加给所有国家。这个国家把自己变成上帝，而不是天上的那个上帝。

这个国家不是我们应该崇拜的真主，而是变成这个地球上的一个新上帝并且要奴役每一个人，似乎大家只是一群牛马。除了这个国家之外，别人都没有意

志、权利或利益；所有东西都属于这个国家。这根本就是疯狂。

利比亚不是同你们面前这项决议草案涉及的活动有关的唯一国家。过去 30 年中，利比亚没有同美国合作，美国也没有同利比亚合作。但是我们活下来了；在我国领土上享有自由、可以自由作出我们的决定并确定我们的立场。我们不接受那个国家领导人、部长或大使们的指挥。这得感谢上帝。

为了实现独立，利比亚牺牲了人口的一半即 75 万人。我们准备放弃这些烈士的英灵去赞扬美国和地球上的任何大国。他们惩罚我们，攻击我们的领空、我们的领水和我们的城市，然而，我们没有被征服。他们对我们实施片面禁运，然而我们没有被征服。他们通过联合国以国际法统的名义根据一项未经证明的指控对我们实行国际禁运。即使在荷兰开庭的苏格兰法庭上，他们没有提供对两名利比亚嫌犯的一丝证据或证明。他们做不到这一点，这只是因为利比亚或者两名利比亚嫌犯同那个事件根本没有牵连。

这些做法都未能使利比亚屈服。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制订法律，不仅是为了处罚利比亚，而且还要惩罚同诸如利比亚、朝鲜、伊拉克和古巴等自由国家合作的任何人——就是那些没有投降的国家。这一行为事实上不是针对利比亚或者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国家或者我没有提到的那些国家；那是针对任何同那些国家合作的公司或国家。

一星期前我在古巴。我访问了一个被称为世界四大旅游点之一的观光城市。那是由西班牙人投资的。建立这座旅游城的西班牙投资者受到威胁并要他不要执行这个重要项目。当然，他没有放弃。然后他们告诉他要停止他在佛罗里达的投资。他说他要放弃在佛罗里达的投资。他们对一个商人，即一个欧洲投资者进行制裁，因为他想在古巴投资。

美国反对古巴，但是西班牙不反对古巴。这个投资者不是古巴的敌人。古巴经过四十年美国禁运之后

仍然存在。这个邻国仍然存在。它作为一个自由国家存在并将永远作为自由国家继续存在下去。

这是不公正的。这是对所有国际准则和协议的侵犯。利比亚是一个自由国家，它站在你们面前并提出这样一项决议草案。利比亚不服从任何人而只服从上帝。不管情况如何，我们不会屈服。

我们不反对他们，他们反对我们。我们没有伤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伤害我们的利益。我们没有侵略他们，他们侵略我们。我们没有断交，是他们断交。我们没有发布任何一项决议对他们实行经济制裁，是他们这样做。我们仍然存在，我们是自己领土上自由的主人。

这些要在本国领土之外对有关国家实施的片面法律行为是针对发达国家、针对工业化国家，本质上是针对欧洲联盟各国和日本，即那些在发展与技术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并在经济活动一切领域拥有大公司的国家。

副主席普拉丹先生（不丹）主持会议。

利比亚是为了大会的利益提出这项决议草案的，即使其形式没有令大家满意，利比亚仍要求大会对它进行表决。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非常实际、务实和灵活。我们愿意采纳可能提出的任何修正案，并愿意接受任何意见和观点，只要它们不抵消决议草案的宗旨。如果有人认为我们指的是一项具体措施，则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所指的只是以对任何国家行使治外法权为目标的单方面决定，这个问题可以在决议草案的标题或实质中反映出来。我们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希望该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因为它涉及并触动我们大家。我对西班牙投资者重点说的话涉及所有投资者、公司和国家。另外，我们绝不应允许出现某一单一国家指挥整个大会和我们大家都隶属于它的先例。

正如我去年阐明的那样，当国际权力平衡有所改变时——我指的不是冷战的结束——一些头脑简单的好心人曾认为，世界将出现一个和平、稳定、重

建……的时期，但在过去十年中，世界即使没有出现冷战，也经历了因国内问题而使用导弹的许多热战、争端和冲突。在其中一些冲突中还使用了战舰、飞机和许多其他武器，新型武器也被试用。这对利比亚来说并不新颖，就我们而言，新武器就是经济封锁，这种封锁使得几百万人受害，其受害者人数超过以前历次战争。

如果大会同意，我提议我们把表决推迟到下个星期初。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只要不改变决议草案的精髓或宗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非常愿意接受任何代表团提出的任何修正案。

我们应该同意，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利比亚。利比亚已经并仍在经历单方面的经济封锁而幸存。我们在美国的所有流动或机动资产都被冻结。其中包括我国在第四十八街的代表团所在地、位于新泽西的大使官邸、甚至还有我们的流动现金。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团帐户现在仍没有解冻，但我们挺过来了。我们没有错。这种封锁以及立法和法律实际上给大会而非利比亚造成影响。

利比亚没有同美国和解的奢望，也绝不要求或乞求美国。美国人当发现欧洲石油公司在中止封锁后来利比亚时，曾口头和以书面文件要求我们维护美国在利比亚石油公司的利益。这就是美国人想从其石油公司和那些在天然气方面有利益的公司中得到的东西。利比亚是灵活、务实和实际的，它不抵制和反对任何国家。我们对任何国家都没有进行侵略，但我们绝不乞求。

我要求愿发表评论的国家公开发言，我们将在得到过去两年中同我们一起投票的代表，即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不结盟运动的代表和许多其他组织的代表，以及不属于上述集团的国家，包括 77 国集团的成员国代表允许后，对任何修正案进行真诚的讨论。我们请求他们同意我们这项灵活的请求，以便使决议草案能够获得一致通过。决议草案表达了国际社会对那个想要将其国内立法强加在全世界头上的国家所持的看法。

林格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千年首脑会议宣言》、作为首脑会议一部分的会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行的讨论、以及本届会议的一般性政治辩论，这些都雄辩地证明我们目前讨论的问题十分重要。

当我们从一个世纪和一个千年迈向另一个世纪和千年时，我们正在达成这样一项谅解，即我们必须根本改变我们对适用强制性措施采取的办法。《宪章》这方面措辞的公正性可以而且必须适应当今世界的现实。在建立把制裁作为经济强制手段的联合国理念过程中，去年可以被视为是一个里程碑。我们看到安全理事会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对在加拿大政府积极参与下开始的“制裁十年”进行了成功的研究。

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高兴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已能够在其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一项建立具体制裁期限的决议，应该对这项决议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进行非常认真的分析和评估。白俄罗斯也欢迎在安全理事会下面设立一个有关制裁的非正式工作组，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成员以及整个联合国将仔细研究并强制执行该小组的建议。

国际社会现在注重关心制裁问题并不是偶然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制裁是对各国施加压力的非常强大的手段，以迫使它们完全遵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责任。

但是，经验表明，全面实施当时规定的模式并非始终能够取得成功。这方面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伊拉克实行严厉的强制性措施之后产生的悲哀的人道主义局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受尊敬的国际组织所作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国际社会面临的一项优先任务就是结束伊拉克人民的痛苦，而这样做的唯一方法就是取消制裁。这一问题的重要方面就是对强制性经济措施对第三国的影响进行研究。例如，白俄罗斯共和国的经济

学家们所作的研究表明了我国经济由于实行制裁而必须放弃贸易关系所受的损失。我们希望，在联合国内对这一问题进行的密切研究将使我们能够得出所有成员国都接受的解决方法。在这方面，捷克共和国有关建立一个小组以研究制裁的各方面影响的倡议能够成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和提出建议的有效工具。我们在建立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进行研究的小组方面的经验表明，我们在这方面有希望获得积极的建议。

最后，我谨指出，白俄罗斯代表团欢迎安全理事会对取消或终止实施制裁的有关因素进行的积极审议。我们希望，在利比亚和苏丹发生的情况将在安理会得到进一步的讨论。切实解决取消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制裁问题正在成为紧迫的议题。就我国而言，白俄罗斯准备在这个问题的所有方面进行富有成效的努力与合作，这是联合国成员的共同目标和目的。

道萨·塞斯佩德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古巴有关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单方面强制性措施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根据这一立场，我国代表团对大会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第53/10号决议投了赞成票，并将对今天摆在我们前面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

人们也知道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越来越拒绝这种强制性措施，这已反映在大会的许多决议中。然而，我们仍然看到这样一种秩序，主要经济和政治大国利用其霸权地位，继续对发展中国家单方面实施强制性经济措施，其明显目的是要把自己的具体外交政策目标强加给这些国家。

我国政府再次强烈谴责使用强制性措施，这些措施也粗暴违反了国际法，严重侵犯了主权平等、不干涉和不干预主权国家内政的原则。

与此同时，实施强制性措施暴露了那些自称为自由贸易旗手的国家的政策的真正性质，这些国家同时为国际自由贸易设置严重障碍，利用贸易单方面把本

国立法强加给其他国家，粗暴无视《宪章》和国际法原则。

以强迫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手段的做法使承受这些单方面政策的人民无法享受人权。世界人权会议和人权委员会反复呼吁各国不要采取违反国际法和《宪章》的单方面措施，这些措施在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中设置障碍，阻止人民充分享受《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文书所阐述的权利，特别是每个人享有健康和幸福的象样的生活水平的权力，包括营养、保健、住房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人权会议还指出，不应当把粮食当作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

国际社会一向拒绝这一政策，并认为它粗暴违反了国际贸易的原则、目标和准则。诸如《托里切利法》、《赫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肯尼迪法》之类的法律和规定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破坏了维持多边贸易制度的努力，而多边贸易制度是平等、安全、非歧视性、透明和可预见的。

也被称为《伊朗和利比亚制裁法》的《达马托——肯尼迪法》对在两个国家的石油部门进行投资的外国人实行制裁，不管这些投资者的国籍是什么，或者它们参与的公司的管辖权在那里，这一法律的政治动机和执行美国国会的发号施令的手段没有任何道义和法律的根据。

古巴共和国政府再次谴责侵犯人民主权的所有域外法案，相信联合国能够发挥作用，确保实现国际社会的愿望和决定。

哈桑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使用和威胁使用强制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手段粗暴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特别是《宪章》第二条子款，该款规定本组织的基础是所有成员国的主权平等原则。

同样，这种措施公然违反了许多联合国有关决议和国际公约制订的原则。例如，我特别要引述 1974 年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该宪章指出：

“任何国家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来强迫另一国家，使其在主权权利的行使方面屈从。”（**第 3281 (XXX) 号决议，第 32 条**）

我要指出的另一个例子是大会 1996 年 11 月 27 日通过的第 51/22 号决议和 1998 年 10 月 26 日通过的第 53/10 号决议。这两项决议重申，每个国家都有追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神圣权利，都有选择其认为最合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权利。通过这些决议，大会对单方面采取的胁迫性经济措施产生的严重后果表示关注，要求所有国家取消这种法律。

采取胁迫性措施——无论是单方面采取还是在多边组织主持下采取这种措施——作为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的手段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真实威胁，这还剥夺了各国人们的根本权利。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对巴勒斯坦城镇实施的禁运给巴勒斯坦人民造成了痛苦，已实施 40 多年的措施给古巴人民造成了痛苦，南斯拉夫人民遭受的痛苦，利比亚人民在过去 8 年里遭受的痛苦，以及伊拉克人民在过去 10 年遭受的痛苦，这些都明确说明，这种措施公然违反了基本人权，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各项原则。

美国以联合国名义持续对伊拉克人民实施禁运，以迫使我国改变政策，剥夺我国的根本主权，这是以胁迫性经济措施作为政治经济胁迫手段的最好例证。这些制裁行动造成 150 万伊拉克公民死亡，其中包括 50 万儿童。每个月，7 000 名伊拉克儿童因这些制裁而死亡，而且，这些制裁对伊拉克重要经济基础结构也造成了巨大破坏——这还没有包括对第三国造成的伤害。

对伊拉克实施的禁运具有种族灭绝罪行的一切特征，是一项危害人类罪。持续实施这种禁运只会增加该地区和全世界的不稳定局势。这项禁运措施使联合国蒙羞，因为联合国各机制被用来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敌对企图服务。

在其外交关系中，美国使用政治和经济胁迫措施的情形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目前，美国正在对世界 70 多个国家实施单边或多边经济制裁，这违反了国际法。而且，正是美国单方面野蛮地使用武力，破坏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在这方面，我要提及这样的事实：自 1991 年以来，美国假借它所说的禁飞区措施，每日都对伊拉克采取侵略行动。联合王国也参加了每日的侵略行动，此外，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土耳其也参加了这些侵略行动，它们为这种侵略行动提供飞行基地和提供后勤支助。

如果允许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政策持续下去，最终将破坏国际社会今天所依赖的根本法律支柱，我要特别提到《联合国宪章》和关于人权的各项规则和原则。国际社会及其各机构应该采取坚定和有效措施，制止武力政策，制止使用胁迫性经济和政治措施。因此，我们紧急呼吁所有会员国投票赞成在这个议程项目下提交的决议草案，因为该决议草案是在国际关系中恢复法治的一个步骤。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下面请南非代表以不结盟运动名义发言。

库马洛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在南非德班举行的第十二次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指出：

“我们必须迎接挑战，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消除侵略、种族主义、使用武力、单方面胁迫措施和不公正经济措施、外国占领和仇外等现象，以便为所有人争取实现世界和平、正义和尊严。”(A/53/667, 附件一,《德班新千年期宣言》)

在那次首脑会议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谴责某些国家顽固坚持加强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单方面胁迫措施，制订在域外产生影响的国内立法。我所指的是封锁、禁运和冻结资产等行动，其目的是阻止这些国家充分行使决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权利，阻止它们充分行使自由扩大其国际贸易的权利。我们深信，必须更加有效地促进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

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而且，必须特别强调，必须使所有国家享有参加国际贸易体系的平等和无歧视权利，必须使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及其入会程序非政治化，使其着眼于经济。

不结盟运动坚信，主要贸易国家增加使用域外措施等行动不符合而且违背在世贸组织商定的国际规则和条例。不公正地以及过度地使用反倾销措施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十分令人关注。

不结盟运动还谴责加紧对发展中国家实施胁迫性经济措施的趋势。在这方面，我们重申，任何国家都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类型的措施——包括不延续最惠国待遇，胁迫另一个国家。我们还反对扩大这种趋势，敦促实施单方面胁迫措施的国家立即取消这些措施。

不结盟运动担心采用强制经济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展努力的不利影响。我们毫不怀疑，这种措施将对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为建立不歧视和公开贸易体系而进行的努力产生广泛的消极影响。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将小国家和大国家一样作为平等的主权国家对待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体系。我们认为，这种民主改革对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国际机构都是必要的。

在今年 4 月于卡塔赫纳举行的第十三次不结盟运动部长级会议上，部长们吁请所有国家不要承认某些国家颁布的对属于其他国家的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的单方面域外法律。他们认为，这些措施和立法威胁国家主权，对其社会 and 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此外，这些措施将发展中国家排斥在全球化进程之外，并与国际法、《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关于国家间和平关系的规范和原则及商定的多边贸易体系背道而驰。

埃尔瓦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同意南非代表刚才代表不结盟运动就我们目前审议的项目“消除以强制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所作的发言。我们今天讨论的大多数措施是

制裁，因此在阐述这类措施的不人道性和不合法性之前，我先谈一下一般的制裁。

秘书长今年关于本组织工作的报告（A/55/1）的第 99 至 101 段表明，国际社会不赞成制裁对平民的不利影响，并指出通常是人民而不是政府付出代价。这与我们都应承认的某件事是一致的：我们应重新审查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制裁。

如果联合国实施的制裁是这样的话，那么国家出于政治目的单方面和任意实施的强制制裁更是如此。强制经济措施不过是用来阻止发展中国家自由选择符合自己文化传统的发展方式的一种武器。这类强制经济措施损害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国际自由贸易和技术转让：发明可能在一个国家设想出来，但常常在另一个国家发展起来。这类措施首先损害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和经济。

大会所代表的整个国际社会，多次拒绝某些个别国家通过的具有域外效力的任何强制法律。第 47/19、48/16、49/9、50/10 和 51/17 号决议都同意，各国应避免通过或实施具有域外效力的法律。苏丹坚决谴责通过任何此类立法，因为它损害《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崇高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和每个国家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

苏丹自己就是这类强制措施的受害者，它呼吁实施制裁的国家解除制裁，并尽快放弃使用制裁，以表明它们尊重《联合国宪章》、国家主权和有关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

我们目前审议的项目的另一个目的是提高所有人民的和平与富足程度。我国代表团强调，不应使用经济制裁来施加政治压力。我们支持决议草案 A/55/L.9 并将投赞成票。

侯赛尼安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感谢秘书长有关题为“消除以强制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的议程项目的报告（A/55/300 和 Add.1 和 2）。这是一份简短然而有益的报告。

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相当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如此，这种情况将继续影响我们的生活。事实上，正如我们都认识到的那样，全球化进程正在积极地扩大和加深社会的相互依赖程度，并正在改变世界资本、货物、服务、劳工和技术市场的关键特点。它还创造了进行国际协调与合作的许多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诉诸单方面和域外强制经济措施构成对扩大国际合作的主要限制因素，并损害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体系的基本原则和基础。

只有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联合国才有权采取胁迫性经济措施。根据国际法，是不允许对其它国家实行单方面和治外制裁的。联合国有大量的文件反对采取单方面行动和治外胁迫性措施。

特别是，大会在许多场合表示不同意某些国家实行的单方面和治外法律。大会认为这类行为侵犯了不干预和不干涉别国内部和外部事务的原则以及其对主权的行使。大会第四十四届、第四十六届、第四十八届、第五十届和第五十二届会议通过的题为“以单方面经济措施作为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的决议，以及大会第五十一届和第五十三届会议通过的题为“消除以强制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的决议，都是能说明联合国对这类非法行动的一系列反应的突出例子。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一些有关原则为本组织解决个别国家实行单方面制裁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方面，1965 年 12 月 21 日通过的《不容干涉各国内政和保护各国独立和主权的宣言》和 1974 年 12 月 12 日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都规定

“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它措施胁迫他国，以谋自该国获得主权行使之屈服，或取得任何利益。”

此外，实行胁迫性经济措施以及批准对此类行动和措施的横向升级具有治外影响的国内法律，还违背

了公认的国际贸易法，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规定。

从 1979 年至 1996 年，共对七十九个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胁迫措施和行动。此类非法措施的性质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在采取单方面措施的同时，也采取对目标国家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具有治外影响的措施。国际一级对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反应也变得更加强烈。多边论坛、区域机构和私营部门越来越多的声音加入到了会员国的呼声之中，呼吁彻底消除和取消单方面治外措施及其它形式的胁迫性经济措施。

联合国几乎所有关于金融和商业问题的决议和决定以及该系统高级别会议的有关金融宣言和结论，都一概强调了建立一个公正的、基于法规的、安全的、非歧视的和可预测的多边贸易体系的极端必要性。会员国还年复一年地一致认可了建立一个有利的和有益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以及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并以此作为推动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份额的必要性。

特别是，这些文件始终呼吁所有国家废止会阻碍自由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的所有措施。这些胁迫性措施还对其所针对的那些国家享有人权具有不利影响。我们都知道，人权委员会也一再重申，实行单方面胁迫性措施会对被作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人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

根据这些原则和承诺，国际社会，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这些非法措施和行动作出了强烈反应。许多发达国家在自己的协调框架内对这些非法手段作了讨论并拒绝将它们付诸实施。有些国家甚至利用国际和政府间机制采取预防行动，以避免诉诸此类措施。

从总体上讲，发展中国家一直有系统地拒绝使用此类措施，包括在 77 国集团加中国、不结盟运动、伊斯兰会议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会议上。近来在哈瓦那的南方首脑会议的最后结果在这方面通过了一

个非常明确的立场。此外，从个别国家来讲，发展中国家还宣布采取旨在消除此类措施在其境内产生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行动。

最后，《伊朗和利比亚制裁法案》作为一个明显的治外胁迫性经济措施的例子，违背了国际法。这是一个非法文件，目的是破坏其它国家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关系。这个文件还违背了《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这个直言不讳的文件妨碍气氛得到任何改善，也阻碍着消除误解和不信任的尝试。

1998 年 10 月 26 日大会第 53/10 号决议对单方面治外胁迫性经济措施的不利影响表示了严重关切，呼吁立即取消它们。决议还呼吁所有国家不承认这些胁迫性措施，呼吁它们不要使用此类措施，如已实行，则废除它们。我国代表团呼吁所有会员国一致通过摆在我们面前的关于审议中的议程项目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的一致通过，将代表着整个政府间机构对《联合国宪章》及其它公认的有关国际文件所奉行的原则、目标和宗旨的集体意愿和承诺。

奥西奥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向你转达我国大使阿瑟·姆巴内福酋长的热烈问候，他由于有其他更紧迫的活动，不能亲自参加今天的会议，因此，他感到遗憾。所以，我以他的名义发表这份发言。

我荣幸地以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名义发言，支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大使早些时候提出的题为“消除以强制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的 A/55/L.9 号决议草案。在表达我们对该草案的支持时，我还荣幸地重申 2000 年 4 月在古巴哈瓦那举行的 77 国集团南方首脑会议《宣言》和《行动纲领》所载发展中国家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关于这个问题的立场。2000 年 5 月 12 日 A/55/74 号文件载有该《宣言》和《行动纲领》。

我谨引用《宣言》的部分内容。《宣言》第 4 段指出：

“我们重申，我们的努力有《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和宗旨作指导，并充分尊重国际法原则。”

第 50 段指出：

“我们对经济制裁对目标国家经济能力产生的影响表示严重关注，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目前利比亚已经履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规定的义务，促请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彻底取消对利比亚的制裁。我们还呼吁立即取消在联合国体系之外对利比亚实施的单方面制裁。”

该宣言对本届大会具有指导意义。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大会 1994 年 10 月 19 日第 49/2 号决议，我现在请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观察员发言。

戈斯波迪诺夫先生（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英语发言）：根据其章程第 2 条，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的总目标是

“随时鼓舞、鼓励、协助和促进各成员协会的人道主义活动，以防止和减轻人类痛苦，从而促进维持和推动世界和平。”

这是本国际联合会在这次辩论中发言的立脚点。实施任何制裁都可能在下述两个目的之间产生矛盾：影响目标国家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以及保护该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尊严。制裁是为了实现第一个目的，但在实施制裁过程中，可能破坏第二个目的。

本国际联合会认为，制裁制度可能而且往往确实加深人类痛苦。社会最脆弱人群、尤其是儿童、社会经济底层的人民、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士对这种痛苦感受尤其深刻。

包括受影响国家的协会以及与它们一道工作的其他国家红十字会在内的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在受影响国家开展了工作，本国际联合会关于制裁问题的观点是建立在这些工作基础上的。

1997 年，本国际联合会通过了第 50 号决定——关于在处于禁运等特别困难局面的国家开展工作的各国协会的决定。该决议注意到，制裁往往使人道主义局势恶化，特别是造成粮食和医药短缺。这是继第 26 次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会议 1995 年通过第 4 号决议之后作出的决定，第 4 号决议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本国际联合会和各国协会促进减少制裁的不良副作用。

上述国际会议由各项日内瓦公约所有 189 个缔约国和 176 个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组成。它在继续处理这个问题，第 27 次国际会议通过的 2000-2003 年《行动计划》提到这个问题。除其他事项外，该《计划》努力保证，人道主义行动的第一优先事项是保护最脆弱人民的权利和满足他们的需要。《计划》第 2 章第 10 段指出：

“各国及本运动鼓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实施经济制裁之前考虑平民的需要，酌情作出人道主义豁免的规定。”

该段接着对安全理事会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制裁的人道主义影响的工作表示欢迎。

对我们而言，而且我们认为，对许多其他人道主义组织而言，这些都是非常切实的问题，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支持我们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成员，并是否能够通过他们援助受制裁影响的脆弱人民。因此，必须认真研究每个制裁制度的实际运作细节。例如，现在已经公认，在实施任何制裁时，必须制定适当程序，规定适当的人道主义豁免。

本国际联合会和各国家协会感到关注的另一个方面是，在实施制裁制度时，这些制裁对目标国家的社会组织可能产生若干破坏性后果。其中一些后果直接伤害该国最脆弱的人民，而且在取消制裁多年之后，这些后果可能仍然存在。这些有害后果包括该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出现混乱，导致最脆弱人民长期失业、社会失序以及长期困苦。

最后，我们敦促各国在制订和实施制裁之前考虑制裁对平民的近期和长期影响；监测制裁后果并以此作为调整制裁制度的基础；以及支持向目标国家最脆弱人群提供救助的努力，提供资源，保证人道主义豁免的实际措施促进而不是阻碍这些努力。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再次根据早些时候作出的决定，我现在请教廷观察员发言。

马蒂诺大主教（教廷）（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借此机会参加对议程项目 31“消除以强制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的讨论。

教廷一向表示关切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与团结。在他于 1891 年所写的教皇通谕“*Rerum Novarum*”中，教皇利奥十三世谈到必须理解指导经济增长和消除贫穷的共同需求和愿望。

在纪念这第一个社会通谕 100 周年之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写道：

“穷人要求得到分享物品的权利，以及很好地利用其工作能力的权利，从而创造一个对所有人更加公正和繁荣的世界”。

不幸的是，分享物品的权利以及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繁荣的世界”受到、并且继续受到实行不仅是强制性的、而且还倾向于扼杀导致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合作精神的经济措施的挑战。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供了 13 个国家政府对他提出的为该报告作出贡献的请求作出的答复。我国代表团认识到，仅收到 13 个答复可能看上去不够；然而，在阅读了这些政府所提供的每一个答复之后，产生了一个更真实的情况，看上去小的数字却说话很有份量。

教廷一向反对采取强制经济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对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社会发展是有害的。在若干场合下，特别在最近结束的大会特别会议上，教廷对这些措施造成的影响表示了关切，不仅仅是对那些作为这些措施的目标国家造成的影响，而且是对那些遭受

作为这些措施一部分的贸易壁垒消极影响的国家造成的影响。在工人大赦年之际发表的讲话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谈到他对承认人类尊严的礼物而得到的报偿的理解时说，

“因此，大赦年要求重新发现工作的含义和价值。这也要求我们处理工作世界中的经济和社会不平衡现象，重新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级系，优先重视男女工人的尊严及其自由、责任和参与。大赦年还促使我们纠正不公正状况，捍卫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和不同的发展模式。”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话及其所传达的感想可以容易地转化到我们今天的讨论中，即纠正经济和社会不平衡现象并纠正不公正现象。

在阅读了秘书长的报告中提供的答复之后，人们清楚地看到，对使用强制措施的反倒是普遍的。摘自在第五十一和五十三届会议上通过的决议的以下段落中，可看到同样的反对立场，大会在这些决议中：

“忆及其无数决议，大会在这些决议中要求国际社会采取紧急和有效措施，以停止强制经济措施”（[第 51/22 号决议](#)）

“表示深为关切单方面实行具有域外效力的强制性经济措施对贸易和金融及经济合作、包括区域一级的贸易和合作产生的消极影响，并深为关切在区域和国际两级对贸易自由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设置严重障碍”（[第 53/10 号决议](#)，[第 3 段](#)）。

我国代表团表示赞成秘书长收到的这些答复和各项大会决议，这些决议要求结束任何强制性的、并且不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措施。

几周前聚集在大会堂的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重申致力于《联合国宪章》。我国代表团希望，千年大会的精神将继续发扬，并帮助结束将阻碍任何国家或人民的社会或经济发展的任何措施。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听取了关于该项目辩论中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我要通知各位成员，将在稍后日期就决议草案 A/55/L.9 采取行动。

一位代表请求行使答辩权发言。请允许我提醒各位成员，行使答辩权发言第一次以十分钟为限，第二次以五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

阿瓦迪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听取了伊拉克代表的发言，他在发言中以不恰当的方法并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提及我国、科威特和我国政府。令人遗憾的是，科威特代表傲慢地、自私地试图将我们谈论的单方面措施问题与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实行的合法制裁混同起来。

伊拉克代表一向故意地提出并混淆这些问题，以为坐在大会堂的人是无知的，并且不理解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错误。

根据我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决议草案的理解和看法，这项决议谈论的是单方面的、在域外采取的经济措施，因此与整个制裁问题毫无关系，也与安全理事会实施的制裁毫无关系。

由于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宪章》占领科威特而对伊拉克实施了制裁。我们科威特呼吁我们在利比亚和古巴的兄弟不要给伊拉克提供任何机会，使其混淆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利用单方面措施问题，为伊拉克违反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宪章》的各项原则和国际法进行辩解。我们呼吁这些国家向其他人作出解释，利比亚和古巴所面临的问题不同于伊拉克今天所说的安全理事会施加制裁的问题。

伊拉克代表明确地谈到了国际法和《宪章》，我愿请教一个问题，他把伊拉克在科威特采取的行动叫做什么？难道伊拉克没有占领科威特吗？一个象伊拉克这样的强大国家占领了一个象科威特这样的弱小国家。他不止一次提到了国际法，我愿向他请教，他把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叫做什么？他呼吁实施国际法，但他在援引国际法之前必须首先要尊重国际法。

伊拉克正在采用相同的陈旧的骄横做法。我们听到了利比亚大使的发言，我们对他极为尊重，但我要知道，伊拉克是否正在采用不同的做法？伊拉克正在象大国那样展示同样的臭名昭著的骄横做法。这是同一种做法。伊拉克正在利用它的权势来促进自身的利益。在涉及到象我国这样一个弱小国家时，它便毫不在乎了，就违反国际法和各项公约侵占了这个国家。

伊拉克对我国所干的事情——诸如空中轰炸——与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我们完全拒绝他试图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我们愿意强调，伊拉克大使今天所谈的问题涉及到单方面制裁。而摆在大会面前的问题并不是安理会实施的合法制裁。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与红新月联会）代表今天谈论的是单方面的强制性制裁，而不是合法的制裁。合法的制裁是伊拉克代表所谈的内容，是根据具有国际合法性的各项决议实施的。

我们重申，我们对此不会保持沉默。如果伊拉克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将作出回答。如果伊拉克大使讨论科威特问题，我将作出回应。伊拉克试图使我们感到害怕，恐吓我们，但我们并不害怕。在伊拉克谈论《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之前，它应该首先对其表示尊重。我们呼吁古巴和利比亚兄弟不要向伊拉克提供为其行为作辩解的手段。

哈桑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很抱歉在这么晚的时候还不得不发言，但我发现我必须对科威特政权代表的发言作出反应。该政权是美国的傀儡，是在代表美国发言。科威特代表想要告诉大会和在此出席会议的各国代表，他们应该谈论什么议题，怎样谈论这些议题，以及他们应该谈论或不应该谈论哪些问题。

这个讲台是一个自由的讲台。各国有权自由地表达其意见。的确，联合国总部位于美利坚合众国，但根据《总部协定》，各国有权在这个讲台上自由地表达其见解——尽管这个讲台位于一个对其它国家人民实行各种类型的胁迫的国家。

在座的各代表团都谈及到了制裁问题，无论是单方面制裁还是多边制裁。当我们谈论题为“消除以强制经济措施作为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手段”的项目时，我们很难无视正在实施的多边强制性措施。

正如我在发言中所说的那样，一些国际组织正在强制实施的许多多边措施，是由于一个霸权主义国家希望这样做。事实上，它们是单方面的强制性措施。对伊拉克实施的制裁就是一个例证。此时此刻，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除了美国和其代理人科威特——都反对针对伊拉克实施的这种制裁。

另一方面，我在发言中有一处提到科威特。我说科威特为美国飞机每日轰炸伊拉克的平民提供了陆上基地和设施。美国的侵略实际上是单方面针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对此没有任何合法的借口、法律依据或联合国授权。这样，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这种行为就是一种侵略行为。任何人为从事这种侵略行为的人提供设施，实际上就是共同从事侵略行为。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提供了设施、陆上基地和财政支持。它们还为侵略伊拉克提供财政支持。事实上，国际社会对这一点完全了解。那些呼吁要求尊重国际合法性和决议的人，应该首先对它们予以遵守。

这种行径已经持续十年之久，而且目前仍在继续。他们每天都在攻击我们，却不承认我们拥有抗议这种侵略的权利。科威特是伊拉克的一个小邻国，其人口大约为 60 万。

因此，我呼吁科威特代表尊重其它国家代表在大会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各代表团，依照议事规则，第二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限于五分钟。

奥迪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不想

详细回复伊拉克政权代表的发言。我们已长期熟知他的指控和谎言。因此，我不会在我的答辩中谈论这些指控和谎言。

关于他就侵略问题所说的话，我们是一个小国，不侵略任何国家，我们的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他所代表的大国才这样做。关于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我们没有恐惧。它是一个友好国家，我们之间按协议行事。在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伊拉克企图分裂阿拉伯人。我们已承诺支持利比亚的正义事业，以维护阿拉伯的团结。我们也同样支持巴勒斯坦兄弟。然而，以色列向伊拉克发出指示说，不要提出可能制造不和的问题。

在我看来，对于谁遵守《宪章》，谁不遵守《宪章》，存在着某种混淆状况。谁是强大、傲慢的国家，谁是小国、弱国？伊拉克所说的一切都是无中生有的。我没有阻止任何人讨论任何议程项目，但我保留表达意见的权利。

哈桑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很抱歉，我再次要求发言，但我的发言会非常简短。我想对刚才有人提出的一点作出回应。

在这个大会堂发言的任何人都应该尊重其他发言者的智慧，他也应该尊重事实和真相。科威特代表说，科威特没有侵略任何国家或实体，那么我们如何解释美国和英国飞机每天从科威特领土起飞，轰炸另一国的儿童？也许科威特代表认为，与美国结成统一战线就有了说谎的资本，国际社会也就会相信他。

科威特代表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涉及以色列与伊拉克之间的关系。他说伊拉克接受并执行以色列的指示。我想各成员自己有能力判断这一指控的真伪。它显然是荒谬的——与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一样荒谬。

下午 1 时 25 分散会